

语言与认知文库
YUYANYURENZHIWENKU

王德福／著

语符学语言 模型研究

YUFUXUE

YUYAN

MOXING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其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王德福／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言与认知文库

YUYANYURENZHIWENKU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其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语符学语言 模型研究

YUFUXUE

YUYAN

MOXIT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王德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004-7604-7

I. 语… II. 王… III. 语符学派—研究 IV. H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2778 号

策划编辑 陈彪

责任编辑 储成喜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361 千字

定价 3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语言与认知文库

主 编 唐孝威 黄华新

编委会顾问

王维贤（浙江大学教授、原中国语言与逻辑研究会会长）

张 侃（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张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方一新（浙江大学）

汪丁丁（浙江大学）

沈家煊（中国社会科学院）

沈模卫（浙江大学）

周昌乐（厦门大学）

林崇德（北京师范大学）

罗卫东（浙江大学）

唐孝威（浙江大学）

盛晓明（浙江大学）

黄华新（浙江大学）

鞠实儿（中山大学）

“语言与认知文库”总序

语言是人类最显著和最独特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使用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特征之一。在不同文明的古籍中，我们都能找到人类对语言本身的早期关注。这些记述就是最早的语言学。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一直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归类、解释各类具体的语言现象，二是探究语言的本质。前者是关于语言的描述理论，而后者则是语言的元理论。20世纪对语言本质研究的一个最根本的推动来自乔姆斯基。“乔姆斯基革命”将语言与心智关联起来，视语言为一个独特的心智器官。

尽管语言是人类最独特和最显著的行为活动和认知方式，但在人类的种系演化和个体发展中，人类展现了广泛存在的其他形式的认知方式。认知研究过去长时期集中在语言符号的思维水平上，如推理、决策、符号表征等内部过程。这种研究范式认为这些内部过程可以独立于行为运动。然而，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认知并不仅仅是纯粹的以语言活动为中心的內部过程，它还包含广泛的知觉—动作耦合、行为运动控制等非语言的认知能力。非语言的认知过程显然与语言的符号式认知不同。研究非语言的认知过程和方式已经发展成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中心主题。

认知科学是研究身心统一的主体是如何发展它们的认知能力和完成它们的认知活动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在不长的半个多世纪中,认知科学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众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识。其间,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导致认知研究的方法和主题的变化。“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概括起来,“第二代认知科学”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我国的认知科学研究总体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国内相继有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以认知心理学和脑研究等为重点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特别是国家“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了认知科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的进展。浙江大学的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就是在“985”工程二期中启动的一个项目。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认知科学的所有基础科学凝聚其中,探索在新的科研运行机制下实现多学科的实质交叉和真正的学科会聚。今天,科技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学科的交叉整合和技术集成,许多重大的创新突破来源于学科交叉中的“边缘”问题。人类的认知既是生物的、个体的现象,也是文化的、社会的现象,因此只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的互补研究中,人类认知的深层统一性才有可能最终揭示出来。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特别策划了该文库，以期推动我国语言与认知的研究。

唐孝威 院士

2006年8月20日

序 言

王希杰

一 选题：语符学

这部专著，是王德福博士在其题为《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博士学位论文，最重要的是选题。题目选得好，就成功了一半。博士生导师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博士生选好博士论文题目。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首先得有价值——学术价值。记得在 20 世纪，“文革”以前，搞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曾受命检查“中央大学”的学生毕业论文。其中有的题目，例如，《涂脂抹粉与脸型之关系研究》等“家政系”学生所写的论文，当时就令我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它们很不符合我们今天的学术论文选题标准和写作规范。而王德福博士则以《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为博士论文论题，其选题之所以富有学术价值，首先是因其选择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结构主义三个流派中的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说——“语符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学流派。

叶尔姆斯列夫的著作原文是丹麦文，世界上懂丹麦文的人

2 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

不多。他的著作翻译成英语之后，其学说才产生了学术震撼。西方人推崇叶尔姆斯列夫，佩服他的学说的精美，比喻为一座象牙塔，却也认为他的学说很难运用。我在《什么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结尾处曾说：

法国语言学家马马丁内（A. Martinet）说：“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好比一座象牙之塔，要想对它有所评价唯一的办法是建立新的象牙之塔。”我们要补充一句的是：“叶尔姆斯列夫和哥本哈根学派的学说是很有独创性的一座象牙之塔。”（王希杰，1991：103）

叶尔姆斯列夫亦因此经常被人误解与曲解。在中国，没有认真阅读过叶尔姆斯列夫的著作，这不妨碍某些“勇敢的”中国学者大胆地批判叶尔姆斯列夫。其实在咱们中国，没有搞懂对方的论著，甚至根本没有看到过人家的 huanaco，就非常勇敢地以权威架势来批判的，也不仅是对外国学者。《叶尔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的中文译者程琪龙（2006）在“译者的话”中说：

国人除了知道欧洲各语言学流派中有个丹麦语符学，知道语符学的主要创始人是叶尔姆斯列夫，语符学理论的方方面面精熟者寥寥无几。有些学者甚至在对语符学思想还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对叶尔姆斯列夫横加指责。

我们一向认为，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方光焘及其弟子们。如此重要的语言学流派，在中国很少为人所知道，反而常常被学者误

解，遭受攻击。这当然是很不正常的。研究叶尔姆斯列夫因此是很有必要的。有关叶尔姆斯列夫语符学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无论是对中国语言学，还是对中国人文学科以及中国思想界，都是很重要的。

中国语言学界，向来热衷于介绍、引进美国语言学说，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欧洲大陆的学术传统。继续深入研究索绪尔，介绍欧洲大陆的语言学大师与经典著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对叶尔姆斯列夫学说的研究，更是应当排在首位的。

王德福博士的专著《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是中国第一部对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展开系统研究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件大事。其实，在国外，关于叶尔姆斯列夫的研究专著也不是很多，尽管叶尔姆斯列夫的学说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影响极其巨大。叶尔姆斯列夫和索绪尔是法国 20 世纪思潮的两个主要来源。

因此，研究叶尔姆斯列夫，既是为了扭转眼睛只是盯着美国的现状，又是对学术研究跟风、赶浪潮、凑热闹现象的一个反动。

二 方光焘

在中国，率先重视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理论，精熟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学说的是方光焘及其弟子们。

方光焘（1898—1964），原名曙先，浙江省衢县人。语言学家、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1914 年赴日本留学，1924 年毕业后回国任教。1929 年由浙江省教育厅派至法国里昂大学攻读语言学。1931 年辍学回国参加抗日活动。曾先后担任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以及中山大学语言学

系、中文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协第三届特邀代表，兼任江苏省文化局局长、江苏省文联主席等职。

曾是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的方光焘，在留学时参加了“创造社”，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过《疟疾》、《曼蓝之死》等小说，并翻译了英国、日本等国作家作品，合作编译出版了《文学入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方光焘发起了“语言与言语问题”的大讨论，被公认为南派语言学的一面旗帜。北京大学教授徐通锵（1997：9—10）在他的代表性著作《语言论》中说：“当时的理论语言学界，北方以高名凯为代表，南方以方光焘为旗帜。他们两人都留学法国，都崇尚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都有深厚的功底，因而即使在‘一边倒’学习苏联语言学的背景下，也能在语言学理论研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方光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从小林英夫的日文本《普通语言学教程》——《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个外语译本——走近索绪尔的。在法国里昂大学读书期间，接受了索绪尔的弟子，如房德里耶等的影响。他终生信仰索绪尔，宣扬索绪尔。他是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的学者。

三 叶尔姆斯列夫

叶尔姆斯列夫是丹麦语言学派的领袖、索绪尔学说的继承人。人们常说，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但格雷马斯则把叶尔姆斯列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真正奠基者。法国女学者埃诺（2005：77—78）在《符号学简史》中说：

《言语活动理论导论》在丹麦出版十五周年后，其英语篇才问世。格雷马斯说他在读到这本书时就像是有一声霹雳打来，这声霹雳也震撼了罗兰·巴特，因为他们一起发现了叶尔姆斯列夫：在枯燥的思考之后，他们都为由这种概念的纯粹所引起的美丽而惊讶。

多斯（2004：91）在《从结构到解构——法国 20 世纪思想主潮》中说：

格雷马斯已经皈依现代语言学，他以索绪尔的传人自居。这一看法使哥本哈根语言学小组的著作变得格外诱人起来，叶尔姆斯列夫的著作更是一枝独秀。在格雷马斯看来，叶尔姆斯列夫是那位日内瓦大师的教诲的唯一忠诚的传人：“（叶尔姆斯列夫）是索绪尔真正的传人，或许也是唯一的传人。只有他才明白索绪尔的意图，并最终清晰地把它概括出来。”^①

叶尔姆斯列夫对 20 世纪法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四 叶尔姆斯列夫研讨班

差不多同时，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叶尔姆斯列夫这“一声霹雳”同样震撼了中国的方光焘。方光焘晚年，做了三件

^① 这是格雷马斯为路易·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Le Language*）所写的序言，Minuit，1966（1963）。参见多斯（2004：91，95）。

事：第一，发起、组织同北京大学高名凯的“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学术论战，其实是旨在广泛传播、准确把握索绪尔的理论；第二，组织南京大学语言学教师、研究生、进修教师等同北京大学朱德熙进行关于《说“的”》的论战，其实质是探索如何引进结构主义以及如何对待美国描写语言学；第三，组织关于叶尔姆斯列夫的研讨班。前两件是战役性的，最后一件则是战略性的。

完全可以说，方先生晚年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叶尔姆斯列夫理论的研究。他组织和主持南京大学的教师、研究生、进修教师集体学习叶尔姆斯列夫。这个学术沙龙，每周讨论一次。从1963年9月开始，开设叶尔姆斯列夫的研讨班，集体翻译《语言理论绪论》——方先生将其译为《语言理论导引》。当时所依据的是英文本和俄文本。方先生、周钟灵先生和陆学海、吴为章等是英文本；黄景欣、卞觉非、冯凭和我等是俄文本。讨论之前，每个人自己翻译，做充分准备。黄景欣主译，负责打印他的译稿，供讨论之用。所谓讨论，就是大家挑黄译文差错，谈各自体会，谈自己对叶尔姆斯列夫原意的把握。每个人都要提出修改意见。会后，每个人都要根据大家意见，修订出一份新的译文来。然后，再准备下一次讨论。讨论非常热烈，非常尖锐。一个标点，一个词语，都斤斤计较，争论不休，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动起感情来了。有人甚至说：“英文本也不是丹麦文，也不能算数的。最好请叶尔姆斯列夫到中国来！请叶尔姆斯列夫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在那个时候，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基本除了星期天，全部时间都花在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导引》上。可一直到1964年7月方先生逝世之时，这本几万字的著作，我们只讨论了五分之三！

五 学术战略家

方光焘生前发表的论著不多，但在中国语言学界，其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成功，在于他的学术眼光，他够资格称为学术战略家。

20 世纪前期，方光焘发现了索绪尔，终生宣扬索绪尔学说。方光焘积极参与主持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和 60 年代的“语言和言语”的学术讨论，实质上就是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两次深入深化运动。中国的现代语言学是在索绪尔学说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文法革新”讨论时期，方光焘和陈望道并肩战斗，高举索绪尔的大旗。20 世纪 60 年代，方光焘和高名凯分别为南北两方的旗帜，在争论之中，共同促进了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区别于老同乡、老朋友、老战友陈望道的地方在于，方光焘的晚年倾心于叶尔姆斯列夫。不同于高名凯的地方也在于，方光焘晚年全力以赴研究叶尔姆斯列夫，高名凯热衷于美国描写语言学。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语言学的区别在于，北京大学注重美国语言学，南京大学钟情于欧洲大陆的语言学。

值得注意的是，乔姆斯基理论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引起了方光焘的高度重视，他要求南京大学的语言学工作者密切关注乔姆斯基。在方先生的指引之下，1963 年秋天，我从俄语篇翻译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正好是大年三十下午翻译完的。

方光焘（1963a；1997：508）在回答我们学生问题的时候，说明引进叶尔姆斯列夫针对的是汉语研究中的现状和问题，主要是三点：第一，偏重意义；第二，注重归纳，忽视演

绎；第三，注重要素，忽视整体。20 世纪 30 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方光焘引进索绪尔学说促进了汉语语法学的发展；五六十年代，他的目标是通过引进叶尔姆斯列夫来促进汉语语法学的进一步发展。

比较叶尔姆斯列夫和美国语言学家之后，方光焘（1963a；1997：509）强调说：“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程度不同地排斥意义，叶尔姆斯列夫却从意义内容和表现形式统一体入手，并不排斥意义。”这也是南京大学重视叶尔姆斯列夫的一个重要原因。

方光焘以战略眼光奠定了南京大学语言学的发展方向。索绪尔学说和叶尔姆斯列夫学说是南京大学语言学事业的基础。中国的索绪尔研究，并不局限于南京大学；但叶尔姆斯列夫的研究，却的确是南京大学的一大特色。

六 叶尔姆斯列夫和我们

当年，叶尔姆斯列夫也曾给年轻的我一个震撼。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绪论》的一开始就说：

语言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瑰宝。语言伴随人类的所有活动，和人密不可分，它是人类形成思想、情感、情绪、愿望、意愿和动作的手段，是人类相互影响的手段，是人类社会最深远的基础。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起码具备不可缺少的语言，人用语言来消解孤独，用诗人的语言和思想家的独白来缓解心智和存在间的冲突。意识因为顿开之初，语言已在我们周围萦绕，随时准备播种初嫩的思维种子，并伴随人走完人生。无论是日常生活

中最朴实的活动，还是最崇高或最亲密的时光，在这些经历中，我们通过语言所给予的所有记忆，为自己的日常生活获取热情和力量。但是，语言并非身外伴随之物，它沉藏于人类心智之中，它是个人和部落继续的记忆，是提醒、告诫人们警觉良知的手段。言语是（好或坏的）个性的显性标志，是地域、民族的显性标志，是崇高人性的特殊标志。（叶尔姆斯列夫，2006：121）

叶尔姆斯列夫就这样迅速地抓住了我们。

叶尔姆斯列夫使我耳目一新。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叶尔姆斯列夫却区分出：

内容——内容的内容 + 内容的形式

形式——形式的内容 + 形式的形式

叶尔姆斯列夫的目标是形式，是内容的形式和形式的形式之间的关系。只有形式的改变引起内容的形式相应变化的时候，才值得我们关注。

叶尔姆斯列夫提出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例如：

体系（语言）和过程（言语）

表现平面和内容平面

常数和变数

相离功能和相连功能

在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体系中，没有孤立的概念，没有可有可无的概念。叶尔姆斯列夫的概念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最典型的就是《语言理论导引》的第十一章结尾的那个图表。所以，西方学者说，叶尔姆斯列夫的学说是一个精美的象牙塔。

方光焘在回答学生提问的时候，非常重视哥本哈根学派的方法论原则。方先生（1963a；1997：505）说：

哥本哈根学派最特别的一点是强调假设演绎法。叶尔姆斯列夫在《语言理论导引》的第四章里，批评了归纳法……在语言研究中使用假设演绎法，从少数的事例里建立起假设，再受数量上不限的大量事实的检验而修正，不应单纯依赖归纳。

方先生（1963 a；1997：508）强调演绎法，这是针对汉语研究的传统的，他说：

从胡适以来，是重视归纳的，“例不十，法不立”。赵元任说：“说有易，说无难”。当然，归纳法要说无是很困难的。这种风气今天依然存在，我们被掩盖在现象里，忘了本质。

重视演绎法可以说是南京大学语言学的另一特色。我的《比喻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从双关研究看修辞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论归纳的辞格和演绎的辞格》等，就是接受叶尔姆斯列夫之后的尝试。

但是，老实说，我们当年参加叶尔姆斯列夫研讨班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理解叶尔姆斯列夫。这是因为，语符学派的理论家大都有数学和物理学背景，物理学方面的哥本哈根学派是非常了不起的！哥本哈根学派重要人物布龙达尔还研究康德哲学，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叶尔姆斯列夫家族出过很多杰出的数学家，其父就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位著名数学教授。由中国大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我们，缺乏数学和物理学训练，自然对其数理逻辑等很难理解；至于具体操作，就更困难